

# 《新民晚報》是怎樣砸爛的？

● 馮英子

## 文革前的《新民晚報》

創刊於1929年的上海《新民晚報》，現在日銷170萬份，訂戶遠及美國，為國內晚報中之翹楚，但「文革」時期卻被「徹底砸爛」。今年為「文革」三十周年，回過頭去看看三十年前往事，很有意思，我為當時當事人之一，因追敘此事，蓋亦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云爾。

到1966年時，上海報紙最有特色的是《文匯報》與《新民晚報》。1949年後《新民晚報》先後吸收、併進了《東南日報》、《大報》、《亦報》和《新聞日報》的一些工作人員。因此，這家報紙的成員來自五湖四海，不復是原先的《新民晚報》了。

文革前，為了體現報紙的集體領導，各地報紙的編輯委員大都由黨員擔任，只有《新民晚報》編委會，還有幾名帶點諮詢性質、或被安排的黨外資深報人。《新民晚報》編輯委員會的成員是：社長趙超構，副社長程大千，總編輯束劬秋，副總編輯周珂、朱守恆，還有幾位是楊志誠、曹中

英、唐雲旌、沈毓剛、張林嵐和我。這11人中，束、周、朱、楊是黨員，束、周是1957年反右後進入報社的，朱原是《勞動報》的副總編輯，楊則由《解放日報》調來。幾個非黨員編委，趙、程、曹、張原是《新民晚報》的老人，唐、沈自《亦報》併來，我則由《新聞日報》調去。

## 文革初期動員的三階段

1966年6月4日，《新民晚報》開始了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動員，由黨組書記束劬秋作報告，號召大家投入。整個運動，大致可以分成幾個階段。

第一個階段是發動群眾，由黨組成立了一個領導運動的「領導核心小組」，各個科室、各個組，也相應成立了「核心小組」。「核心小組」以介紹情況為名，實為運動群眾。要揪那些人出來，貼怎樣的大字報，其實都由「核心小組」準備妥當，群眾不過是被他們運動出來，作為運動初期的打手。有的大字報，由「核心小組」派人寫好，留下一點空檔叫「革命群眾」簽

名，有的「群眾」以為簽了名就算「革命」，於是喜孜孜地寫上自己的名字，不料後來形勢變化，自己竟成了「牛鬼蛇神」。

6月7日起，第一批大字報開始在報社出現，首先被點名的是體育組記者馮小秀，他在上海體育記者中極具名望，但敵偽時期在報社工作，受過處分，所以第一個被揪出來。跟着揪出來的是副刊組兩位姓陳的編輯，大字報標題叫《〈新民晚報〉的CC》，真是駭人聽聞。接踵而來的，是貼社長趙超構的大字報，其後是程大千、曹中英、姚蘇鳳和我的大字報。平日幾位編委共處的辦公室，被說成是「議論室」，而所有編委，也自然統統被叫作「黑幫」了。非常清楚，運動一開始，《新民晚報》的黨組負責人的鞭子是重重抽在一批老知識份子身上的。

不料這個局勢保持了沒有幾天，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運動也就進入了第二階段。這時，由毛澤東制定的「五一六」通知已經下達，徹底否定了「二月提綱」，號召批判混進黨、政府、軍隊和文化等領域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。

《新民晚報》同《文匯報》都在外灘的圓明園路上。這時，《文匯報》正在揭發陳虞孫，有人在《文匯報》看到了陳虞孫被貼大字報，說陳有一篇題為〈鍾馗捉鬼〉的短文通過束紉秋發表在《新民晚報》上。《新民晚報》的「造反派」一查報，發現文中有「四個毛賊」這一句，認為是攻擊毛主席的「罪證」。於是，他們馬上貼出大字報，揭發了這個所謂攻擊毛主席事件，一時間群情激盪，義憤填膺。在這個形勢下，黨組的「核心領導小組」招架不住了，群眾紛紛要求上海市委派來工作組。

6月下旬，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三個人進駐《新民晚報》，以胡潤松、李建華、朱守恆、王玲、趙有餘組成了五人小組，領導《新民晚報》的運動。

這個工作組的第一件工作，就是鼓勵束紉秋站起來。但作為黨組書記和總編輯的束紉秋卻被群眾認定為「黨內走資派」，在「攻擊毛主席」事件發生之後，他更是站不起來了。大字報一下集中到束紉秋、周珂、王玲三個人身上。這時，工作組開始採取了「打擊一大片」的手段，擴大打擊面，以減少「黨內走資派」的壓力。

8月17日中午，《新民晚報》的「造反派」就在「工作組」的支持下，把趙超構、程大千、曹中英、唐雲旌、張林嵐、姚蘇鳳、吳崇文、樂小英和馮英子九個人，叫到俱樂部中去「鬥爭」。鬥爭會結束之後，由各組的學習組長通知上述被鬥的九個人「停職檢查」，並把他們的藤辦公椅取去，換上普通的凳子。第二天，又沒收了這九個人的所有證件，包括當時上海文化俱樂部的出入證等等，規定九個人集中在一起，在報社內部做清潔工。趙超構有一次悄悄地對我嘆氣說：「連一張辦公桌也沒有了，還有甚麼可說的呢？」

不久之後，「造反派」即打出了「清查四舊」的牌子，到各個被鬥者家中去抄家。他們在各個被鬥者的家中翻箱倒櫃，無所不查，甚麼衣服、書籍、照片、信件等無一幸免，地板也被撬開，壁爐上的煙囪，牆上的護壁，也被敲破。因為我是從香港回來的，按照他們的邏輯，以為一定有不少「反動」的東西。不料折騰了半天，一無所獲。一個「造反派」查到了一套周谷城的《中國通史》，以為大有發現；一個「造反派」對着一套《資治通



圖為文革時期在上海  
左右運動的重要人物  
——徐景賢。

鑑》，橫翻豎翻，不知道講的是甚麼，最後放了下來，卻把我的信件、香港帶回來的身分證一起拿去了（這些東西後來不知所終）。

1966年8月22日，《新民晚報》的「文革」領導小組成立，但當時的「工作組」也並未撤退，報社的「黨組」同時存在，實際上這一階段的運動就是由這個「三駕馬車」所主宰，《新民晚報》的運動進入了第三階段。

「文化革命委員會」（簡稱「文革會」）成立之後做了幾件工作。第一件事就是把報社門口《新民晚報》四個大字扯下來，放在報社門口，當眾焚毀，並在當天由「文革會」負責改出了《上海晚報》。可惜《上海晚報》的好景不常，到了所謂「一月風暴」前夕，它也在一場風暴中垮台了。

「文革會」的第二件事是開了一個所謂「反革命罪證展覽會」，把在抄家中所得來的金銀首飾、生活用具、衣服、書籍，都當作「反革命的罪證」展出。如東初秋的一架萊卡照相機，一頂法國式的便帽，特別是一些金銀首

飾，如家屬的鐲子、戒指，都成了「罪證」。

### 「一月風暴」和「牛棚」

「文革會」登台後，報社內的各種造反組織紛紛出現，每小組成立一個戰鬥隊，3、5個人成立一個「司令部」，互相鬥爭、互相吞併，最後歸結為「井岡山聯合造反司令部」與「毛澤東思想造反指揮部」兩大派（簡稱「井岡山」、「指揮部」）。這兩派無休止的內戰，長期控制和影響着《新民晚報》的運動，報社成為上海最出名的「老大難」單位。

這兩個派別，「井岡山」加入了上海市新聞界革命委員會（簡稱「新革會」）。「井岡山」背後的策劃者，實際就是張春橋和徐景賢；而「指揮部」則加入「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」（簡稱「工總司」），而「工總司」的頭頭即後來成為「四人幫」之一的王洪文，此外還有潘國平、陳珂大等人。所以，「指揮部」實際上也是王洪文一夥。這

兩派，「井岡山」以職員為主，「指揮部」以工人為主；職員的辦法多，工人的力量大。兩派不斷發生衝突，經常大打出手，天天打打鬧鬧，一直鬧到「一月風暴」。

所謂「一月風暴」，就是從《文匯報》開始的奪權，把在「文革會」手中的「權」奪過來。《文匯報》一行動，《新民晚報》馬上跟上。當時，《新民晚報》已被改成《上海晚報》，「指揮部」一派工人多、力量大，一開始就衝入「文革會」辦公室，奪到了權。於是「井岡山」一派被趕出報社，在外流浪。

過了不久，張春橋提出「聯合鬧革命」的口號，「井岡山」在張春橋的支持下回到報社，宣傳「聯合」。為了促使兩派聯合，王洪文、潘國平這兩個「工總司」的頭頭也來到報社，為「指揮部」撐腰。雙方各有背景、各有打算，議來議去卻始終「聯合」不起來。那時，「井岡山」的司令部設在圓明園路五十號三樓，「指揮部」的大本營則在二樓，兩派勢如冰炭。為了增加各自的「本領」，被關在「牛棚」裏的「牛」，也成為雙方爭奪控制權的對象。

那時，在《新民晚報》的所謂「牛棚」中，關着十三個人。「牛棚」設在三樓樓梯上面的一個小房間中，十三個人膝頭相對，動也不能動，據說這是當時一個叫嚴克英「造反派」出的主意，目的是在折磨「牛鬼蛇神」。「牛棚」門口貼着一副對聯，寫着「廟小妖風大，池淺王八多」。

1967年3、4月間，張春橋在一次談話中主張拆散「牛棚」，兩派乘此機會各有活動。但當時的「權」在「指揮部」手裏。那年5月13日，「指揮部」貼出了大字報，宣布除了「反動學術權

威」和「走資派」之外，其餘的人一律「解放」，回到各自的組內「參加革命」。被「解放」的九個人中，除了陳心浩是工人技術人員之外，其餘都是老知識份子。當時，「井岡山」遭到「指揮部」抵制，凡是屬於「井岡山」控制的幾個小組，一個人也回不去。於是，九個人只好單獨成立學習小組，推我作「召集人」。當時各個學習小組都出有牆報，我們也不例外，牆報取名《爭朝夕》。

### 製造《爭朝夕》冤案

1967年冬，江青發動了「清理階級隊伍」運動，張春橋也定下了橫掃文化界的陰謀。《新民晚報》的「井岡山」趕快給徐景賢、張春橋送去了一份材料，說報社有個叫《爭朝夕》的「古怪組織」。11月22日上午，徐景賢、王承龍在康平路接見「井岡山」的中心組成員，徐景賢說：

你們晚報是一個資產階級新聞觀點和文藝黑線相交織的單位，是一個大黑窩。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，真正挖出這些壞人、叛徒、特務、文藝黑線內部的人物。……到必要時，把那些公諸於眾。

12月16日和20日，「井岡山」兩次上書張春橋，捏造《爭朝夕》八個人的「罪狀」，表示「晚報階級鬥爭要從這些人身上揭蓋子是揭定了」，並且「熱切希望春橋對我們的鬥爭給以寶貴的指示」。張春橋在「井岡山」材料上作了批示。於是，上海新聞界一場罕見的迫害事件終於開始。

1967年12月22日，那一天是農曆冬至，當天出版的上海《文匯報》和

《解放日報》都用極大的篇幅登了署名「《上海晚報》井岡山聯合造反司令部部分戰士」的所謂〈革命群眾來信〉，內容是這樣寫的：

編輯同志：

我們以萬分憤怒的心情，向你們揭露《上海晚報》內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們報社冒出了一個名叫「爭朝夕」的組織。這個古怪的組織的成員是些甚麼人呢？有瘋狂編寫帝王將相，才子佳人連載小說的反動學術「權威」、有叛徒、有漏網右派、有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夏衍「二流堂」中的伙計、有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指導科長、反動黨團骨幹份子、有30年代文藝黑線人物、當年瘋狂攻擊魯迅的小勇士。就拿其中的反共老手、漏網右派、黑畫家樂小英來說，這個傢伙解放前一貫畫反動漫畫，解放前還畫了《名人百態圖》這幅黑畫，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，無恥美化蔣賊夫婦；解放後賊心不改，繼續大畫反革命黑畫，瘋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。

就是這樣一批烏龜王八蛋，竟然打着造反的旗號，煽陰風，點鬼火，上竄下跳，挑動群眾鬥群眾，矛頭針對革命造反派，妄圖反攻倒算。就是這批烏龜王八蛋，把自己打扮做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」，公然頓足拍台，誣蔑革命群眾「把我們打成牛鬼蛇神」，要「追根」，要革命群眾檢討。革命群眾準備批判《新民晚報》十七年的新聞黑線時，他們眼看革命烈火要燒到自己頭上，慌忙跳出來攻擊革命造反派，妄圖以批判「五十天」來保「十七年」。甚至公然貼出反革命大字報，說甚麼「嗣後凡是未參加組

織的革命群眾開會商討有關事宜，我們有權利，也有責任參加，不得歧視，否則，你們所作出的決定，一概無效」。請看，這批混蛋的反動氣焰多麼囂張，他們要「造」誰的「反」，不是一清二楚嗎？

……

這封「部分革命群眾」來信，《文匯報》登出時用的是四行黑體字做標題：〈《上海晚報》內一小撮右派翻天說明了甚麼？〉；《解放日報》用的是五行宋體直排標題：〈把混入新聞隊伍的壞人揪出來〉。兩報還各自登了一篇實際上由「井岡山」起草的「編者按」，長達千字的「編者按」只是重複這封信的內容，殺氣騰騰。當天上海的人民廣播電台，也廣播了同樣內容的新聞，說明張春橋、徐景賢之流對上海新聞界的進攻是迫不及待了。

22日晚上，「井岡山」糾集了上海師大和其他院校的紅衛兵，組成一支打手隊，分八路到被他們稱為《爭朝夕》的成員家中採取行動。那天遭殃的是程大千、曹中英、張林嵐、唐雲旌、姚蘇鳳、樂小英、吳崇文和我八人。這八個人中間，除程大千臥病在床，吳崇文有四個兒子在邊上保護和唐雲旌外，其他都受到極大的毆辱。

那天傍晚，我回到家中的時候，由施慶德帶領的一批「井岡山」，已在我家大門口刷上了大字報，看守了我的前後門。我一進弄堂，他們就把我揪在地下，施慶德還站在我的小腿上，他們輪流毆打我，逼我交代為甚麼從香港回來？是不是派遣特務？過了一會，又將我拉到弄堂中去批鬥，把我的頭揪到垃圾箱中，向公眾宣布我是「反革命份子」。

不知他們怎麼知道我那天去過一

個姓許的朋友家中，又把我押到那位朋友家中，七手八腳抄了他的家。直到次日清晨一、二點鐘，又把我從朋友家中帶到茂名大樓的門房間，熟門熟路的從門角落裏拿出行刑的木板之類，然後由幾個人把我按在地上，打我的屁股，把屁股打得像肺一樣腫大，到凌晨四時左右，才放我回去。

那次事件之後，我足足臥牀半月，才告康復。後來知道曹中英、張林嵐、姚蘇鳳、樂小英那晚所受的折磨，遠遠超過了我。他們用板刷打曹中英的耳光，鮮血淋漓，而那天正好是曹先生的六十壽辰。他們把樂小英打得眼睛幾乎掉了出來，使樂先生在彌留之時，仍有餘悸。而且，從此之後，又把我們八個人關入「牛棚」，變本加厲，加以折磨，三日一小打，五日一大打。只要「井岡山」的「造反派」高興，隨時尋點事故就可以將你毒打一頓，而且隨時會到你家中行兇，來

時必定拉上窗簾，守住電話，把你同外界隔絕，然後為所欲為。

## 虐待「牛鬼蛇神」

當時，報社兩派是今天這派揪一人，明天那派揪一人；今天是威風凜凜的「造反派」，明天卻變成「牛鬼蛇神」。《新民晚報》當時全部員工有219人，先後被揪出的有76人，佔了總數的三分之一，後來被列為「審查對象」的有66人，佔全體職工的31%。

「牛鬼蛇神」的隊伍不斷擴大，對「牛鬼蛇神」的人身侮辱與精神虐待也日新月異，與日俱增。兩派對「牛鬼蛇神」的限制規定也越來越多，歸結起來，大概有如下幾點：

- 一 上班、吃飯，都要向毛主席請罪。
- 二 每人每月發十五元生活費，家屬十二元。



三 每餐菜金，不能超過人民幣三分錢。

四 坐時不許兩腿交叉。

五 走路不可以抬頭。

六 不許看大字報。

七 有病讀《老三篇》醫療。

八 每天要交代一份「罪行」和思想匯報。

九 任何行動，要事先請示匯報。

「牛鬼蛇神」還要被強迫做一些力所不及的勞動。天熱了，就把「牛鬼蛇神」派到高溫澆版車間勞動，而且不給勞動保護，滾燙的鉛屑濺在身上，馬上是一個爛洞。有時冒着炎暑，替「造反派」去運冷飲，一不小心還要挨幾下耳光。做夜班的時候，半夜或清晨回家不管遠近，都得步行。

《新民晚報》有一位叫董天野的畫家突然被「井岡山」揪出來，把他打得鼻青口腫，關入「牛棚」。有一天，「井岡山」的「造反派」把他從「牛棚」中叫了出去，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。第二天，有人說他跳黃浦江自殺了，有「遺書」為證，可是始終沒有撈到屍首，幾十年來一直是個懸案。一句話，凡是可以虐待人的勾當，「造反派」都想出來了。

那年春節，也是所謂「清隊」的不久，每一個「牛鬼蛇神」的家門口都要貼一份由「造反派」統一起草的「認罪書」，規定不許撕掉，也不許脫落。有趣的是，經過幾天，起草這份統一「認罪書」的「造反派」，自己也變成「牛鬼蛇神」被打入「牛棚」了。

「造反派」還「勒令」「牛鬼蛇神」向當地街道里弄的造反派組織報到，接受監督和批鬥。平常鄰里之間有點小恩小怨，或者子女吵過架，或者算水電費有過爭執，這一下都乘時尋釁

了。他們可以分配你去掃弄堂、掏陰溝、洗牆壁，而且規定掏陰溝一定要用手去掏，不能用其他工具。這種混亂的局面，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期。1968年9月，「工宣隊」和「軍宣隊」進駐《新民晚報》，運動才進入另一階段。

### 工宣隊進駐，漫長的 「鬥、批、改」

「工宣隊」是北京的發明，上海很快就跟了上去。從1968年9月開始，上海各新聞單位進駐「工宣隊」和「軍宣隊」，第一個行動是把各報紙、電台集中於上海淮海路、汾陽路口的教育學院和汾陽路上的海關學校，一起進行「鬥、批、改」。這時，《解放日報》、《文匯報》、電台、電視台因為還有業務，所以分成大班子和小班子，小班子搞業務，大班子參加運動。而《新民晚報》則早被「砸爛」，自然不必分甚麼大小班子，把所有人集中起來就可以了。

「工宣隊」和「軍宣隊」進駐以後，開始搞「鬥、批、改」。整個新聞出版系統組成一個團，有「團長」、「政委」、「軍代表」等等。每一個新聞出版單位組成一個「連」、有「連長」、「副連長」、「指導員」等等。《新民晚報》的建制為十九連，連長叫劉正香、副連長為周珂、指導員是王玲，專案組的組長是朱守恆。「工宣隊」把連隊當作真正的軍事單位，每天跑步、上操，按着步兵操練做立正、稍息、分列式等動作；另一方面則繼續要把「壞人」揪出來。本來已很龐大的「牛鬼蛇神」隊伍，至此就更加龐大。《新民晚報》的幾十個「牛鬼蛇神」被集中在樓梯底的一間房子裏，有的揀到一張破板凳，有的弄一隻破木箱，有

的弄幾塊磚頭砌起來作凳子，十分狼狽。而「牛鬼蛇神」中也還有些「積極份子」，對於別人的一言一行都向「工宣隊」或「造反派」匯報，以示自己的忠誠。因此，「牛棚」中每天總會發生一些新鮮事兒，不是說這個「不老實」，便是說那個「想翻案」。

到11月中，「工宣隊」又出了個主意，宣布全體下鄉去「支援三秋」，地點是上海縣的虹橋公社，其地在西郊公園以西，並且規定全體從上海教育學院步行到虹橋公社，行軍休息途中還不斷進行批鬥。他們不知從甚麼地方弄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謂「材料」，硬要曹中英先生承認他是「特務」，在西郊公園門口大門特鬥，把一個六十歲的老人折磨得死去活來。曹先生後來每談起此事，仍耿耿於懷，不能或釋。那次「支援三秋」，一直到過年前，才撤回上海。

1969年冬，從北京傳來了甚麼「六廠二校」經驗，「工宣隊」自然也加緊了「鬥、批、改」。儘管專案組的人四處奔走，各方搜羅，他們在我身上實在找不到甚麼材料，於是大膽假定我是「特務」。因為照他們的邏輯，我在香港曾是兩家報紙的總編輯，待遇好、地位高，為甚麼要回來呢？一個知識份子對國家、對民族的感情，他們是永遠無法理解的。有一次他們對我進行批鬥，要我交代做「特務」的罪行，那個連長操着江北口音問我：

「你有甚麼證據，證明你不是特務？」

我反問他：「你有甚麼證據，證明我是特務？」

他理屈辭窮，老羞成怒，拍着桌子說：「囂張，囂張！」

兩邊的「造反派」，一看苗頭不對，趕快拿起那本小紅書，大叫：

「打倒特務份子馮英子！」一場鬧劇，就此收場。這樣的鬧劇，每天在這個大樓裏的每一層、每一室反反覆覆地演出。

1969年5月，「九大」召開前後，新聞出版系統在陝西北路的辭書出版社搞了學習班，把各單位的一些負責幹部弄去學習，由軍代表韓宗禮負責。在開學典禮上，韓宗禮稱大家為「同志」，宣稱學習回去之後即可「解放」。但事實上根本沒有此事。大抵也在這個時候，林彪的「一號命令」下達，散布着大戰即將爆發的空氣。新聞出版系統的人統統被趕下鄉，先是在奉賢縣的新寺，後來又在柘林附近的「五七幹校」，進行了漫長的「鬥、批、改」。在這裏，很多幹部繼續受到迫害，有許多人被定了性。兩派繼續鬥爭，「井岡山」漸佔優勢。

1974年，新聞出版幹校的團部由團長沈鴻壽在1月7日召開《新民晚報》幹部會議，並在會上宣布撤銷「十九連」，所有工作人員分調到別處工作。那年1月，我被調去辭書出版社工作，從新聞界被趕了出來。創刊於1929年的《新民晚報》，終於在這場「文化大革命」中被徹底地消滅了。

**馮英子** 當代著名的記者和雜文家，1915年2月生於昆山。1949年後，為香港《星期報》、《周末報》、《文匯報》總編輯，1952年回國，為上海《新聞日報》編委，《辭海》編審，《新民晚報》副總編輯，1993年離休。著有《馮英子雜文選》等十幾種。馮氏現在身兼上海市雜文學會副會長，上海市新聞學會顧問，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副會長等職。